

# 我曾是“戈比鬼”（下）

## 作者是黄新聪



结果累累的咖啡树丛和刚采摘的咖啡豆

我童年的早餐经常是一杯咖啡和两块炸大蕉



生咖啡豆

经过炭烧的咖啡豆

咖啡粉

明白，纵使带几十斤咖啡，也有“断粮”之日，但还是要带三几斤回去解馋，然后逐渐减量，直至戒掉“咖啡瘾”。回国时，我的行李不多，在雅加达海关过磅时，只有18公斤，但其中就有3公斤咖啡粉和2公斤白糖。回到广州后，我逐日减少咖啡的食量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我私下试验连续三天不喝咖啡，自觉情绪稳定，精神正常。我暗自庆幸戒除“咖啡瘾”成

功。1950年末，我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参军，临行时已不再为“咖啡”所困扰；我的背包里没有咖啡，是轻装踏上征途的。在航校工作的头三年，我从未喝过咖啡，也未曾闻过咖啡的香味。直到1953年的冬天，我又同阔别多年的咖啡“有约”了。当时，我们团从空X师调来的新团长罗荣凯很爱喝咖啡，当我从他的办公室走过时，立即闻

到一股熟悉的咖啡香味。原来罗荣凯团长是抗日战争时期从缅甸回来的侨生，他喝咖啡的习惯未改，而且偏爱“南洋咖啡”，喝咖啡又从来不加糖。他知道我是从印尼回来的，惺惺相惜，便邀我下班后到他的宿舍喝咖啡。当晚，我在他那里喝了一杯又浓又苦的“咖啡乌”，回宿舍后，不知神经的那个兴奋点受到了刺激，我一夜未曾合眼，第二天上班，精神萎靡不

振，不断地打瞌睡。而罗荣凯团长呢，仍精神抖擞地在机场塔台指挥飞行训练和带飞学员。

从东南亚回来的华侨，即使离开侨居国几十年，仍难改喝咖啡的嗜好，而且偏爱“南洋咖啡”。罗团长即是一例。无独有偶，1958年我又遇到了一位嗜好咖啡的“老革命”。我在《牡丹江日报》工作时，报社的副总编辑郭永绵，是抗日战争初期从新加坡回国投笔从戎的华侨。郭总戎马生涯20余年，南征北战，是个身经百战的老革命，转业前当过志愿军某师政治部副主任，所有这些经历都未能改变他当年的生活习惯；至今，他每天早上仍是喝过了咖啡后才上班，而且偏爱印尼咖

啡，他值夜班时总要冲一杯特浓的“咖啡乌”。可以肯定，他早年在新加坡，也是个“戈比鬼”！

喝过印尼咖啡的人，是不喜欢喝欧美咖啡的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，舶来品充斥国内市场，咖啡也不例外，什么雀巢咖啡、星巴克咖啡，还有意大利、土耳其品牌的，林林总总。但是从印尼归来的华侨还是喜欢喝印尼咖啡，喜欢它特有的香、浓、苦、醇的味道，这是欧美咖啡无法媲美的。在印尼咖啡断供时，我就喝具有印尼风味的海南兴隆华侨农场的“兴隆咖啡”，以满足味觉要求。

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，但每天下午还要喝一杯香醇略带苦味的咖啡。